方志敏就义前致党中央的一封信

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式镇湖塘村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赣东北(后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5 年 1 月，方志敏在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以 7 倍优势兵力包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方志敏本人也因饥寒交迫，晕倒在怀玉山陇首村一棵大树底下，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三旅的部队捕获。2 月 2 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委员长驻赣行营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囚禁。8 月 6 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牺牲前一个多月，即 6 月 11 日上午，他深情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向党表明斗争到底的决心。

信的内容大体上为 4 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信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被俘入狱之初，以为很快被杀。但过了一个多月未杀；随后江西反动派开‘剿匪’阵亡将士大会，我们又以为必以我们为祭品，什么都准备好了，只待拖去杀，但仍未杀。一直挨到现在，还未有消息。”

方志敏在信中分析了敌人不急于杀他们的 3 个原因：“(一)进行政治欺骗，表示他们的‘宽大为怀’！(二)用威逼利诱的方法劝我们投降，以便更大地破坏革命；(三)一面留住我们在狱中不杀，同时就可以在外造谣，说我们已投降了他们，来动摇正在艰苦奋斗的红军和群众的斗争决心。敌人是在用各种方法，破坏我们。”

第二部分是向党报告狱中斗争情况。方志敏认为，“自杀非我们应取的手段，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越狱的准备”。“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他分析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 4 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谈他的狱中文稿。为了延长敌人杀害的时间，方志敏利用敌人要他写《自传》而提供的笔做武器，写下了大量文字。据统计，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中，有一半是他在狱中写成的，约 16 万余字。方志敏向中央报告说：“我写了几篇文稿，托人送给党中央。”他列出了 7 篇文稿：“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相当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罢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为了使此信和文稿能送到党中央，方志敏还对胡罢人的情况作了介绍。

这 7 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他 6 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早就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

第四部分是向党中央报告狱中情况。信中说：“现我们所囚押的狱中，共押同志和红军战士 500 余人，他们都苦极无告！请中央通知互济会，设法救济他们。同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组织和领导这些同志进行狱中暴动，是有十分可能的。”在被关押的 500 多人中，包括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

在信的末尾，方志敏特别说道：“胡海同志亦押在此，他不久也是要被枪毙的。这里枪毙人不大宣布。”胡海是中央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土地部部长。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病，卧在栊子外竹床上有 20 余天，黄瘦得不像人样。方志敏隔着栊子与他谈过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果然，仅过了 4 天，即 6 月 15 日，胡海就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枪杀了。

方志敏致党中央的信及其文稿，经过多种途径辗转，最后送到了上海。

(摘自《百年潮》)

吴晗何以受到胡适器重

相识　吴晗来到上海遇到了胡适

在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念书时，吴晗经常旷课，还学会了吸烟、打麻将。若不是因为他的国文、历史两科成绩优异，他早就被开除了。1927 年中学毕业后，吴晗想继续求学，而父亲出于经济原因，只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个小学教师的饭碗。父子之间大吵一架，吴晗随即离家出走。那晚大雨滂沱，家人以为他掉入池塘淹死了，打捞了一晚上。

几天后，父亲收到儿子的信，吴晗说自己打算到天台山当和尚，那里有学问渊博的师父。因为同学的接济，吴晗最终没有出家，而是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学。

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怀揣着剩下的资费，来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遇到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

赏识　吴晗得以拜入胡适门下

1930 年 3 月，21 岁的吴晗第一次给胡适写信，说自己打算认真校读《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佛学典籍，请胡适给予指点。

此后不久，胡适辞职，回到北平。于是，吴晗决定转学燕京大学。然而，以他在中国公学的“丙等”英文成绩，根本不可能被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接收。还好，他去北平前，请中国公学的另一位教授写了推荐信，得以见到异常爱才、时在燕京大学执教的顾颉刚。在顾先生的安排下，吴晗在燕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

顾颉刚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的生年当在 60 岁以上，而吴晗在燕大图书馆看到的史料则说，胡应麟死于 1602 年，享年 52 岁。这个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重要的问题，恰恰是胡适、顾颉刚等权威学人的兴趣所在。吴晗似乎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尽搜有关胡应麟的资料，写成了一本《胡应麟年谱》。

书稿完成后，吴晗即刻呈送胡适，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功夫，多多指教”。这本年谱真是深得胡适的喜爱！胡适此前曾“大胆假设”胡应麟死时约 50 岁，可惜并无时间去搜查证据，现在吴晗不仅“帮”他验证了假设，而且初步厘清了胡应麟一生的行踪，胡适怎能不对吴晗怦然心动呢？诚心一片的吴晗终于赢得了胡适的器重，得以拜入胡适门下。

提携　吴晗逐渐成为学术新星

1931 年初，吴晗决定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投考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结果，他的文史与英文皆考了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北大的规定是，只要有一门零分便不能录取，胡适也不愿坏了规矩。

吴晗只得转考清华大学，成绩仍是文史、英文皆 100 分，数学零分。不过，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

胡适去信清华大学时任校长翁文灏，请后者大力培养吴晗，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解决他的经济问题。

在胡适等人的提携下，吴晗逐渐成为备受学界瞩目的学术新星。正因为有胡适等人的关照，吴晗丝毫不用担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1934 年毕业前，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意聘请吴晗。不过，最后还是清华史学系得到了吴晗，让其担任助教，主讲其擅长的明史研究，月薪 100 元，比一般的助教高出 40 元。不久，他又升为讲师，月薪 125 元，足够应付当时的各类开销了。

(摘自《周末》)

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

最近，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走西口》形象地反映了上世纪初山西人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某些历史细节，引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北京日报》2 月 18 日刊登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的文章，讲述了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摘编如下。

历史上的“走西口”，亦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走西口”中的“西口”，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最早的“西口”特指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后来则改指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清朝政府出于移民实边等诸多方面的考虑，鼓励放垦蒙地、发展农业。于是，晋、陕民众遂呼朋引类，前往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上述诸种因素的合力，遂导致了清初至民国时期，“走西口”之风愈煽愈炽。

近年来，由于《乔家大院》等晋商剧作的热播，不少文学作品、舞台艺术都简单地将“走西口”与晋商的精神内涵、成功之道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更以“走西口的哥哥曾最富”为题，将“走西口”的男子与晋商等同起来。其实，“走西口”之人的成分极为复杂，并不能简单地与旅蒙晋商等同视之。根据历史学界的研究，“走西口”之人，既有来自晋中的贸易商贩(其中当然有部分巨腹商贾，但更有下层的提篮小卖)，也有营谋开垦的丁壮，还有一些为逃避兵役和官司的社会闲杂。一般说来，“走西口”之人，开始是春去秋回的“雁行人”，主要是些揽长打短的青壮年男子，后来逐渐发展为携家带眷永久性的移民定居。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地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此种交流，除了前述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在文化上的交融亦相当显著。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走西口》，状摹的是太原府女子孙玉莲，与丈夫太春新婚不久，就遇到了“咸丰正五年，山西省遭年限”，只得离开爱妻，外出走西口。该剧刻画了一对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在离别之际凄苦缠绵的情景。《走西口》剧种的流行很广，目前所见，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均有《走西口》。但就像“西口”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涵义一样，《走西口》主人公玉莲的籍贯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陕西的《走西口》，就说孙玉莲为延安府人，而不出自太原府。这首脍炙人口的山西民歌，将男女至爱、离情别绪与人生苦情一并抒发，以凄婉的歌声，揭开了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饱含着时代的沧桑。

当然，也应当看到，“走西口”的移民运动，亦存在一些负面的影响。诚如西北民谣所述：“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内地民众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这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遂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人们为了寻找新的生计，前往口外蒙古地区发展，他们初莅异地，其农耕活动难免带有一些盲目性。因此，汉地农民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开发了原本不宜开垦的土地，破坏了一些天然草场，导致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黄艾华摘)

陈云的不“加”不“减”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1 月 12 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提出，对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遗留问题，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他列举了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问题等 6 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其中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关于康生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982 年，有关单位要把陈云这篇发言收入一本书中，提出要在彭德怀后面加上“同志”两字，康生后面的“同志”两字去掉。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就此请示陈云怎么处理。陈云说，前一个“同志”不能加，后一个“同志”不能减，要保持当时的面貌，因为当时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后来就“同志”两字加减的问题又反复了几次，陈云都没有同意。只是在这篇发言收入《陈云文选》时，他才勉强同意在彭德怀后面加了“同志”两字。

(摘自《北京日报》)

宋时轮修改战略方针

1980 年深秋的一天，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将李际均叫到办公室，说：“新中国成立 30 年了，我们还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落脚在‘诱敌深入’上，这是不行的。”

据李际均回忆，此后的一个星期，他借阅了 50 本我军在战争年代的电报汇编。李际均发现，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提过几次属于战略层次的“诱敌深入”，其他大量的都是战役、战术层面的“诱敌深入”。有了历史依据，宋时轮决定向中央军委提出修改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对李际均说：“报告起草完，就马上送过来给我看，我等你！”

李际均花了 4 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报告初稿。完稿时已经凌晨 2 时 30 分，他拨通了宋时轮家的电话，宋时轮正等着他呢。

在同年 10 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上，邓小平作了结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 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摘自《南国都市报》)

天下邓姓源邓州

在河南省邓州市城区东南，有一座松柏翳翳、芳草萋萋的沧桑陵园——邓国侯吾离陵。这座高仅四五米，周围长不过十余丈的陵墓却沉睡着我国第一个见于正史的邓国国君——邓国侯吾离。

邓姓是我国的百家大姓之一。据姓氏学家考证，现今遍布海内外的邓姓绝大部分来自商周侯国——邓国的邓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邓，曼姓之国，今属南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邓公簋”条亦云：“邓国故地在河南邓县”(邓州在 1913 年至 1988 年为邓县)，均明确指出，商周时的邓国故地就在河南省邓州市。夏朝初年，大禹把邓州作为都城，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中明确记载“邓为禹都”。后来，禹的孙子仲康把他的一个儿子封到这里，以邓为国名。

为觅邓姓渊源，笔者到邓州探访。经人指点，从邓州城区向东南方向驱车 3 公里左右，来到邓国侯吾离陵。

邓州市原政协主席、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德堂对邓姓的起源与繁衍有深入的研究。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带领寻访者一同走进邓姓发源以来 3000 多年的沧桑：

吾离名宣，字吾离，是十九世邓侯。在位时他内修政理，外结邻好，使邓国中兴，屹立于列国之林，被称为中兴之君。吾离约于公元前 700 年病逝，葬于国都南郊，历经 2700 余年风雨沧桑，陵存至今。这是现存唯一的邓国国君的陵墓，所以人称之为“天下邓氏第一陵”。

现在遍布海内外的邓姓绝大部分源自商周邓国。经过 3200 多年的迁徙、繁衍和发展，邓氏后裔如今已遍布全国。且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 20 多个国家都有分布。徙居各地的邓曼后人心系祖根，用族谱、碑刻，对联等形式，传递邓姓源出邓国这一信息。香港邓氏宗亲会会徽两侧的对联是“溯赐姓于殷商，邓国之衣冠如昨；纪封侯于东汉，云台之军令犹新”。四川广安的《邓氏分谱序》说：“我姓始于周之邓国，盛于汉之高密，一朝三驸马，一门二十九侯，唐宋元明代有伟人”等等，既道出了邓氏宗族之源，并骄于先祖历史的辉煌。

站在吾离陵前，邓国的历史浓缩在几行楷体小字中：邓州在夏、商、周三代为邓国，秦时置穰邓二县，隋文帝开皇三年置邓州，1913 年改为邓县，1988 年复称邓州。一个邓字从远古一直用到今天，使邓州成为世界邓氏寻根祭祖的圣地。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